

不是天生赢家，怎么把大学学“回本”？

——读《金榜题名之后》

陈心怡

广西师范大学

DOI:10.12238/mef.v8i12.15033

[摘要]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超70%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进入高校,其发展分化现象成为学界关注焦点。本文以《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为核心文本,结合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程猛底层文化资本研究等文献,通过群体分类比较,探究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因文化资本匮乏、信息壁垒陷入“直觉依赖”困境,遭遇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延迟性排斥。在学业规划、职业准备等关键节点遭遇系统性挑战,导致高等教育“回报不足”。基于此,研究提出三维突围策略:通过认知重塑、资源整合与制度革新,为第一代大学生构建公平的发展通道,破解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制约。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第一代大学生; 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How Non-Elite Students Maximize College Value: Lessons from 《After the Golden List》

Xinyi Chen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over 70%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FGCS) enter universities, making their developmental disparities a key academic focus. Centering on the core text *After the Golden Roll: The Mystery of College Students' Divergent Pathways*, this study employs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Cheng Meng's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underprivileged groups. Through comparative group analysis, it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breakthroughs for this population. Findings reveal that FGCS face "intuitive reliance" due to insufficient cultur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barriers, encountering delayed exclusion through cultur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s. They confront systemic challenges at critical junctures (e.g., academic planning, career preparation),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returns" on 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s. Consequently,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breakthrough strategy: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framework aims to establish equitable pathways for FGCS and dismantl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capital

1 引言：从“金榜题名”到“平台失灵”

1.1 普及化时代的群体图景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正深刻改变着大学生群体的生存图景。随着2023年毛入学率攀升至59.6%，高校在校生规模持续扩张，其中超过70%的学生属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其父母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一庞大群体既彰显了教育公平政策的显著成效，也面临着独特的成长挑战：他们肩负着家族首代知识精英的荣光，却常常在大学生活的迷宫中囿于不知所措

的困境。

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发现，在最终的学业成就指标（如毕业率、平均绩点）上，第一代大学生与其非第一代同龄人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研究甚至揭示，部分第一代大学生展现出更强的学业韧性、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并在学业上取得了同等甚至更为优异的成绩。

另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指出，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适应大学学习过程以及最终

学业成果等方面,往往面临系统性挑战,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种劣势可能源于文化资本缺乏、社会网络局限、经济压力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因素。

郑雅君通过对清华大学、复旦大学62名学生的追踪访谈,发现同届毕业生中,既有手握25万年薪offer的“精英预备役”,也不乏简历空白、不得已延毕的“后知后觉者”。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此得到生动诠释:决定学生发展差异的并非智力或勤奋程度,而是家庭背景——这只“无形的大手”——干预着学生认知框架的形塑。

纵使跨越高考的雄关,叩开顶尖学府的扉扉,也难逃“平台失灵”的困局。“失灵”(Failure),其源可溯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笔下那只“看不见的手”。在他构想的理想市场图景中,这只手本应如精妙乐章般,自然调和供需,高效配置资源。然现实常如蒙尘之镜,因信息迷雾、垄断壁垒、外部侵扰或公共之善的缺失,市场机制黯然失能,它无力兑现其优化资源、增益福祉的诺言。

将此镜鉴转向高等教育圣殿,名校作为承载万千期待的“平台”,本应化身一片沃土,为所有播撒其中的种子——无论来自何方沃野或瘠土——提供公平的日照、丰沛的雨露与畅通的生长条件,令人才之林葳蕤繁茂,个体价值粲然绽放。然而,理想之光在此折射变形,平台之诺遭遇了冰冷的“失灵”:寒门学子怀揣热望而来,却惊觉名校许诺的、通往阶层跃迁的“黄金阶梯”,布满了无声的荆棘与隐形的沟壑。

1.2 行动分野:精英与寒门学子的不同路径

书中描绘的景象,正是现实生活的深刻映射。大学远非简单的知识传授场所,而是一个需要主动解码的复杂系统。优势家庭学生往往自带“导航系统”:他们熟稔如何将社团经历转化为领导力证明,懂得在学术竞赛与实习安排间做优先级排序。这种看似天然的适应力,实则是家庭文化资本经年累月的熏陶结果。

相比之下,许多寒门学子则可能经历不同的路径:他们或许将几乎全部精力投入课堂学习,力求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却在毕业时发现用人单位更看重项目经验、行业洞察等“软实力”。那些能显著提升就业竞争力或深造机会的关键项目、重量级实习或国际交流名额,往往在信息不对称或缺乏针对性指导下,于他们尚未充分意识时便已错失,导致寒门学子“赢在起点,困在途中”。

本书精准地呈现了名校光环下的这一现实困境。它拆解了那些看似顺风顺水的“榜样学子”成功背后的细微脉络,为那些在复杂系统中摸索、尚未掌握其隐形规则的弱势背景学生,提供了一幅识别资源与挑战的游戏地图。

1.3 寒门困境:从个体焦虑到结构反思

本书将个体性寒门学子的出路焦虑转化为公共性的结构反思。当读者发现“原来我的迷茫并非全然能力欠缺只是经验缺失”时,个体长期背负的自责感便开始瓦解。原先的寒门学子对自身的遭遇“沉默不语”恰是“被压迫教育学”的一种体现。他

们往往通过极致的努力在单一评价维度上取得“光鲜”成绩,似乎跨越了阶层门槛。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场域后,却发现成功所需的游戏规则远非书本知识所能涵盖。这套规则往往内嵌着优势阶层的文化密码、隐性社会网络与特定的“身份标签”,构成了无形的“压迫”结构。他们的“沉默”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在这套不熟悉、不对等的规则面前,其原有的、以应试能力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累积难以顺畅转化为有效的社会资本与身份认同,导致其经验与困境难以被主流话语真正听见和理解,陷入结构性失语。书中大量真实对话记录构建起“经验共同体”,让读者在“你我共在”的共鸣中突破自我归因的思维定式。这种“被看见”的体验,亦如威利斯强调的“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为结构性困境提供情感支点。

2 文献综述:寒门学子在国内教育环境下的地位与发展综述

2.1 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梳理

自1970年代布迪厄(Bourdieu)文化再生产理论^[1]引入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以来,学界对教育不平等的解释长期聚焦于宏观结构对个体的决定性作用。渐渐地,传统研究范式的解释力逐渐显现其局限。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阶层惯习与教育场域的结构耦合机制”,但其分析框架未能充分解释个体在结构与能动性互动中的主体地位。这种理论缺失在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2]中呈现为另一种困境:当研究者聚焦工人阶级子弟对学校文化的反抗时,不自觉地陷入非此即彼的叙事模式,将守规矩的“循规生”简化为“家伙们”的对照组,忽视了“书呆子”群体内部复杂的文化创造力。这种分析范式反而复制了其试图批判的隐性文化压迫,忽略了“物或损之而益”的可能性。

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3]中实现了关于寒门学子群体发展的重要理论突破。通过对农家子弟教育流动轨迹的深描,他系统论证了底层文化资本的客观存在与运作机制。这种资本形态既不同于布迪厄笔下的精致化文化符码,也区别于威利斯所述的抵抗性亚文化,而是表现为三重独特属性:(1)苦难转化力——将物质匮乏经历转化为坚韧品格的养成资源;(2)道德势能——利用孝道伦理建构家庭共同体的奋斗合法性;(3)混合策略性——在传统伦理与现代规则间发展出情境化生存智慧。该研究有效消解了“底层文化真空论”的理论偏见,为教育公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程猛的研究聚焦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发现与阐释,揭示了寒门学子向上流动的内在动力机制与文化资源。而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引入“目标掌控模式”、“直觉依赖模式”与“转变者”路径的对比研究,构建了一个跨越阶层边界的分析框架。这种双轨叙事突破了过去如《学做工》《“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我的二本学生》的单一群体观察局限,全景展现了教育场域中隐性的代际优势传递。

理论突破不仅需要深描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更需解构优势阶层的文化霸权,为寒门学子在现实生活中争取更多的选择

权提供理论指导。首先，本书打破了“金榜题名必然成才”的迷思，揭示精英阶层的游刃有余实则是家族资源的多代积累；其次，通过记录寒门学子的主动调适，证明个体能动性对结构限制的突破可能。优势阶层的资源运作与寒门子弟的价值坚守，共同构成当代高等教育分化的双重图景。

2.2与寒门对位的先知者：“天生赢家”的理论溯源

与寒门学子不同，“天生赢家”指那些借助家庭代际传递的规则认知优势，在大学中精准匹配系统规则，将多数投入转化为进阶筹码、将高等教育场域转化为确定性收益系统的先知先行者。

布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4]中揭示的“魔术般成功”现象，恰为“天生赢家”提供了原型注解：这类群体凭借家庭携带的文化工具箱，让文化资本代际传递，使其教育投入皆能精准嵌入制度预设的回报轨道。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通过实证研究将其具象化为“目标掌控模式”^[5]。与“天生赢家”相对的，另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体被描述为“先天不足”但“奋发图强”，在杨中超与祝军^[6]的实证研究中解释了所谓的“不足”，是第一代大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等方面与非一代大学生相比均处于劣势地位。这进一步揭示，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职业发展中的困境，实质是结构性认知落差与制度性排斥的复合产物，而所谓“没学回本”的遗憾，往往源于信息差造就的行动时差。这种差距不是天赋的鸿沟，而是代际传递的经验差，是认知起跑线的不对等。

3 比较分析

3.1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文化区隔：大学是“迷宫”不是“赛道”

高等教育机构常被浪漫化为追求真理的圣殿，但其内在运作逻辑实则构成一座充满隐性规则的认知迷宫。在《金榜题名之后》的批判性考察中，作者创造性地采用“迷宫”隐喻替代“长跑”的传统线性叙事，概括了潜藏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结构性区隔机制。这种隐喻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保留了学术殿堂的神圣性想象，又清晰暴露出制度性通道的复杂性与非透明性，为解构大学建造起独特的分析框架。

弱势群体学生往往将高等教育视为改变命运的核心通道，却可能遭遇多重认知困境。当他们在“全面发展”“学术追求”的价值导向中迷失方向，在学业竞赛与社团活动的双重要求中进退维谷，在就业准备与理想叙事的断裂中无所适从，实质正经历着教育场域的文化区隔效应。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对学业评价体系的误解与策略失误。例如，来自浙江省工人家庭的初晓在南方大学读力学类专业，他和许多类似的直觉依赖者如牛铭一样，在低年级时持有一种观点：已经看重成绩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进入名牌大学，理应追求自由探索和自我成长，不必再重视像绩点这样饱受诟病的结果性评价。牛铭曾坦言大一视GPA为粪土，初晓也认为大学时光应用于增长见识、开拓兴趣，不必重视成绩，道听途说的亲戚建议更强化了这种想法。结果是，以后再想提升已为时晚矣。

这种结构性矛盾源于高等教育场域的“制度性虚伪”。大学既承担着职业预备场所的社会功能，又可在官方话语中刻意淡化这种关联。理想主义修辞将为就业而做出努力的职业规划贬斥为庸俗的功利行为，却未提供替代性的价值补偿机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海文这样的学生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倾向，其态度可以概括为不在意成绩本身，却尽量不错过它所能带来的好处，至少不让它成为一种阻碍。以海文为代表的优势阶层的学生，由于眼界的开阔、家庭资源的充裕、更少受到观念枷锁的束缚，拥有灵活务实的文化解码能力，反而能够从跨越这种认知鸿沟，专注于职业发展的有序规划，一步步变成看似毫不费力的“天生赢家”。

对比之下，底层学生往往陷入认知过载，既难以完全接纳理想化叙事，又缺乏实践理想的具体策略，极易在两个极端中摇摆：或是轻视规则而付出代价，或被规则过度束缚而视野狭窄，只知埋头考试，错失机会，眼睁睁看着大学经历中的投入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和经济收益，回报率不理想，“学不回本”，在价值迷思与信息壁垒中经历着更深刻的精神困顿。

这种教育场域的区隔机制最终演变为阶层再生产的隐形推手。高等教育的神圣帷幕之下，残酷的筛选逻辑就此揭开：它考验智力水平，更考验文化资本的积累厚度与运用能力。多重门槛，使得“教育改变命运”的承诺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强烈的吊诡性。

3.2两种典型的大学生实践模式

根据郑雅君的分类，在迷宫里，学生群体迅速分化为两类截然不同的探险者：“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短期内，前者步履从容，后者茫然四顾。

3.2.1目标掌控者的策略优势

“目标掌控者”目标明确，并且知道如何去达成目标，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例如在核心实习项目上倾注全力，而对通识课程仅维持基础投入，使得每一份努力都成为未来发展的有效跳板，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

3.2.2直觉依赖者的结构性困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秉持应试思维踏入大学的“直觉依赖者”。面对多元评价体系的冲击，他们或机械延续“学业至上”的惯性，将全部精力投入课程考试；或对职业准备产生道德抵触，视实践探索、人际交往、课外活动为对纯粹学习的耽误、背叛。这种状态看似自由探索，实则是信息缺失引发的被动反应。

3.2.3两种模式孰优孰劣？

当以综测成绩、就业率等外显性指标衡量学业成就时，“目标掌控模式”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这类学生惯用目标分解策略，其投入产出比更符合现行评估体系的量化要求。反观“直觉依赖模式”，他们在大学阶段的自由探索虽难以转化为即时可见的成果，却可能促进自我同一性建构、意义世界拓展等内隐性发展——这些深层成长往往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外化为职业成就、社会贡献。

任何教育都具有“延时性”与“瞬时性”。当前教育评价遭遇的深层矛盾在于:大学作为“长期回报系统”的本质属性,与劳动力市场“即时筛选机制”的运作逻辑存在根本冲突。当我们仅用毕业节点的短期指标来评估人才培养质量,实质上是用工业化标准丈量人才的有机生长过程。这种评估偏差不仅导致对“直觉依赖模式”产生价值误判,更可能助长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绩效主义异化。

4 突围策略:从“迷宫求生”到“规则破壁”

高等教育场域的“学回本”命题,本质上是社会再生产的隐蔽机制与个体文化资本重构之间的博弈。学子在精英高校中所遭遇的“迷宫困境”,既非单纯的能力欠缺,亦非偶然的制度疏漏,而是结构性排斥与个体策略失效的复合性症结。如何从迷宫中筑起俯瞰全局的高台?如何让教育投资回报最大化普惠每一个学生?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认知重塑、资源重组与制度赋能”的协同机制,将个体的能动性实践嵌入教育公平的生态化改革中。

4.1 认知重塑:从自我归咎到理性批判

“迷宫”对优势群体是可控系统,对寒门学子却是障碍场。寒门学子需完成从“个体失败叙事”向“结构批判视角”的认知跃迁。家庭背景所衍生的文化资本差异,本质上是历史积累与社会分层在教育场域的投射,而非道德层面的个人缺陷。

承认阶层差异的客观性,但拒绝对其进行本质化解读。知道迷宫存在,本身就是找到出口的开始;辨识高等教育中隐性筛选机制,如竞赛起步方法、科研准入标准的运作逻辑;将职业准备从“功利主义污名”中解放,这不过是为教育增值的正当诉求。

4.2 资源整合:寻求支持,建构路径

当原生家庭的文化资本供给与高等教育场域的规则体系出现断裂时,寒门学子需通过系统性策略重构资源网络。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信息获取方式的革新,更包含关系网络与工具系统的生态化重组,其核心在于构建适应大学规则的新型支持体系。

4.2.1 编织信息网络

信息网络的编织是首要突破口。学子可通过组建跨年级教研政策解读群,形成代际间的信息传递链条,消解信息断层;定期检索教育部学科竞赛白皮书等权威文本,应对规则变动,将碎片化信息转化为结构化知识资本,正如书中所言:“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警惕“虚假忙碌”,参与过多低价值活动(如耗时却无含金量的社团),导致精力耗散,反之,行动应具有靶向性,对核心目标进行“饱和式投入”,沉淀成果,建立个人数据库。

4.2.2 激活人际网络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应试教育范式下,中国学生,尤其是农村学子,普遍存在“互动贫乏”的现象。当前应试教育体制将师生互动异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传输,导致课堂场域中的教学交往“荒漠化”。但社会是有人情温度的,通过课程展示、学术会议等场

景主动链接心仪的导师、志同道合的伙伴,有意识地将偶然接触转化为持续性关系。通过创设校友咨询预约系统,将离散的个体经验转化为结构化的指导机制,使职业导航从非正式的关系馈赠转变为基于权利义务的规范化支持。这一举动不仅规避了传统人情网络的随机性与排他性,更通过程序正义保障资源获取的公平性。目前有民间自发的组织在执行这一理念,如伴行青年,围绕青年成长中的认知和技能需求,为立志向上的青年伙伴提供长期陪伴成长的赋能体系,使青年获得自我安放、自我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能力。

4.3 高校制度革新:让支持系统可视化

个体努力需与制度支持形成合力才能让力的作用最大化。当前高校的困境在于:其宣称的“育人公平”与实际的“规则黑箱”形成悖论。破解之道在于推动支持系统的显性化改造。

文化资本补偿机制的建立是首要突破点。这要求高校超越传统经济资助范畴,直指代际传递的文化资本缺口,构建“经验代际传递系统”,通过往届生成成长案例库建设,将碎片化个体经验转化为结构化生存策略;实施“学术-职业双轨支持计划”,为学子配置学术导师(指导论文发表与科研规范)与职业导师(提供行业趋势解读与实习路径规划),形成文化资本的双向补给通道。

5 讨论与总结:教育的本真价值

5.1 “学回本”的理念澄清

当我们在效率维度讨论“学回本”时,绝非鼓励功利主义的短视算计,而是期待高等教育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的“价值兑换通道”。真正的“回本”意味着通过显性规则建设与文化资本补偿,真正的“回本”,是让寒门学子在认清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差异化策略实现自我增值,而非复制特权阶层的标准化路径。

5.2 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如果说,从个人角度出发,帮助每个学生找到人生使命与谋生手段的平衡点,是教育的真谛,那么在宏观视角下,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7]。尤其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大国全面竞争背景下^[8],高端人才储备既要求“质量”,也要抓“数量”。若高等教育继续默许隐性规则对寒门学子的制度性排斥,不仅会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更可能加剧社会阶层固化。这要求教育公平必须实现从机会均等到过程正义的范式升级,在制度层面构建起对抗文化再生产的防火墙。教育公平必须从“入学机会公平”走向“过程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统一,使每个踏入知识殿堂的学子,都能获得与其努力相称的发展可能。

[参考文献]

- [1]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 [2]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3]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5]郑雅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

[6]杨中超,祝军.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赤字和优势视角下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成长之路[J].中国青年研究,2024,(08):84-93+83.

[7]张辉蓉,覃若男.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政策的实践样态、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

[J/OL].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5-03-05].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DB/OL].新华网,2022-10-25.

作者简介:

陈心怡(2004--),女,汉族,江苏苏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家庭教育。